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2009年北京CBD研究基地年度报告

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 集聚路径研究

2009

蒋三庚
王曼怡
张杰 等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2009年北京CBD研究基地年度报告

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 集聚路径研究



蒋三庚
王曼怡 等著
张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路径研究:2009年北京CBD研究基地年度报告/
蒋三庚,王曼怡,张杰等著.—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 - 7 - 5638 - 1665 - 1

I . 中… II . ①蒋… ②王… ③张… III . 中央商业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09 IV . F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081 号

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路径研究——2009年北京CBD研究基地年度报告
蒋三庚 王曼怡 张杰 等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泰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1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1665 - 1/F · 660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

《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路径研究——2009 年北京 CBD 研究基地年度报告》出版在即。受邀写序,谈一谈我对 CBD 基地研究与发展的关注和展望。

当前时代是服务经济时代,CBD 是服务业发展最典型的载体和平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CBD 研究基地成立于 2004 年 9 月,是北京市首批成立的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之一,该基地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依托,以研究 CBD 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树立了把研究基地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 CBD 研究和咨询机构的发展目标。

迄今,CBD 研究基地经过 5 年建设,不断拓宽研究领域,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北京市重点课题等研究项目,逐渐形成了优势明显、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注重 CBD 发展的理论研究,对 CBD 形态产生和发展历史及其规律、条件及成因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深层次探索,并形成持续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继续发挥 CBD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对 CBD 国际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类别的现代服务业集群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内 CBD 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通过主动承担政府部门的应用研究课题,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咨询和研究报告,取得了较为深入的社会影响。通过研究,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结出了一批硕果,凝练了研究方向,逐渐树立起研究品牌。

作为品牌研究项目,5 年来,CBD 研究基地每年推出一部研究报告,形成了系列丛书。这些研究报告根据每一年的研究主题展开,既有理论研究又兼容了实践检验,既有发展思路又提出了对策建议。年度性的研究报告既是年度性 CBD 发展状况的综合概括,又蕴含着新的一年的发展路径探讨,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提升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2009 年的年度报告以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路径为主题进行研究。这一主题立足当前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前沿,基于北京,着眼全国,提升了研究的高度。报告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全球范围内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指出了我国 CBD 发展的主要特点,并针对北京 CBD 的发展提出了思路

和建议。报告既是 CBD 研究基地研究成果的凝练,也从侧面反映出基地研究范畴的延展和深入,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宽和专注。

作为重点研究基地,CBD 研究基地几年来整合并引领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各学科协调研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加强对 CBD 的研究,探索新世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紧迫性和长远战略性。由此,欣然作序并祝愿 CBD 研究基地取得更大的进步,切实推进我国 CBD 的建设与发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 年 11 月 7 日

序 言 二

中央商务区(CBD)作为城市功能区重要组成部分,在都市建设中具有突出作用。《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路径研究——2009年北京CBD研究基地年度报告》一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CBD现代服务业集聚和发展规律,对现代服务业理论研究和探索CBD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该报告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该报告不仅梳理了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机理、特征和竞争优势,而且探索研究了CBD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演变规律,为后续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二是充分运用比较研究。该报告择取具有借鉴意义的国际著名CBD,包括美国曼哈顿CBD、日本东京新宿CBD、巴黎拉德方斯CBD等,对其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借他山之石以攻中国之玉。三是实践分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该报告立足国内主要CBD,特别是以北京CBD功能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发展态势分析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CBD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四是围绕CBD建设和发展主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新的见解和思路,反映了CBD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着“重基础、树特色、强实践、勇创新”的指导思想,近几年,CBD研究基地内强修炼,外树品牌,形成了一批持续性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对我国CBD建设和相关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次出版的报告,是CBD研究基地自2004年成立后定期编写的第五部年度研究报告。该报告是CBD研究基地众多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次凝练和总结。我愿意为该书作序,并向大家推荐此书,希望这一研究成果同样会对北京CBD乃至全国各城市CBD的建设有所裨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丁立宏

2009年11月6日

目 录

1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理论研究	1
1.1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机理	1
1.2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特征	7
1.3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竞争优势	16
2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演变规律	19
2.1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	19
2.2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四阶段的理论分析	39
2.3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四阶段的实证分析——案例检验	57
3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国际比较	63
3.1 国际著名 CBD 发展简介	63
3.2 国际著名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借鉴	77
3.3 国际著名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政策借鉴	84
3.4 国际著名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人才集聚借鉴	89
3.5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国际借鉴	96
4 我国主要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特色	99
4.1 发展定位倾向于特别功能区模式	100
4.2 发展方式倾向于以规划指导为主、市场形成为辅	103
4.3 产业布局表现为以商业发展为主、以商务办公为辅	105
4.4 产业特色表现为突出强调金融业发展	107
4.5 产业政策集中于企业入驻相关资金的返还补贴	112
4.6 产业关联不够密切,企业调整频率较高	114
4.7 人员流动较受制约,国际性产业人才匮乏	116

5 北京 CBD 功能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分析	119
5.1 北京 CBD 功能区发展沿革	119
5.2 北京 CBD 功能区发展建设因素分析	123
5.3 北京 CBD 功能区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概述	126
5.4 北京 CBD 东扩发展态势简介	133
6 北京 CBD 功能区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建议	138
6.1 协调布局集群发展链条	139
6.2 统筹建立集群发展平台	141
6.3 引导培育重点行业集群发展	144
附件一:悉尼 CBD 区域行动计划(2007—2011)	159
附件二:中国 53 个 CBD 现代服务业发展简况一览	164
北京 CBD 研究基地 2008 ~ 2009 年大事记	178
后记	182

1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理论研究

1.1 CBD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机理

关于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均集中于制造业，鲜有服务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相关论述。但是产业集聚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所有产业。^① 只是各个产业的其他特点决定了集聚的其他差异，因此研究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形成机制可以从制造业集聚研究中获取理论基础。

1.1.1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首先从外部经济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马歇尔对产业集聚理论最大的贡献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对规模经济进行了分类；二是对外部规模经济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剖析。

1.1.1.1 规模经济的分类

马歇尔把规模经济分为两类：第一类规模经济称为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主要是指单个企业内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企业的产出更大规模地增加，从而使平均成本相应下降；第二类规模经济称为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是指整个产业（行业或城市化）发展规模的扩大使得该产业内单个企业带来降低成本的好处。同时，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企业集群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马歇尔指出，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一般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认识，在内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厂商会尽可能使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企业外部规模经济同样十分重要，企业集聚在一定区域正是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结果。

近年来，学者关于外部规模经济和集聚的研究更加深入。海德森

^① 克鲁格曼在1991年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模型的结构内容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流动。证明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

(Henderson, 1997, 1998) 认为外部性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行业内的外部性 (intra – industry externalities)，也叫 MAR 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表现为行业层面的外部性并进而导致产业集聚；二是行业间的外部性 (inter – industry externality)，也叫 Jacobs 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指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位于同一区位所产生的外部性，强调行业外部性导致产业集聚。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行业内的外部性导致了同一产业内企业的集聚，这种外部性来自于行业规模的扩大，我们称之为区域化经济 (localization economy)；行业间的外部性导致了不同产业的企业集聚，这种外部性来自于行业间的差异性 (differentiation)、互补性 (complementarities)，我们称之为城市化经济 (urbanization economy)。区域化经济是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行业规模的扩大导致单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城市化经济是诸多行业间（城市化）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城市整体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目前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被认为是集聚效应的两种形式，要分析集聚产生的原因只需探讨外部规模经济的成因。

对于不同产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海德森（1997）还指出，普通制造业集聚对规模要求较高，而对差异性要求不高；高科技行业的集聚对差异性要求较高，而对规模要求不高。因此，普通制造业倾向于在专业性城市集聚，而高科技行业、知识密集型行业倾向于在大城市集聚。可以这样理解：专业性城市的形成和扩张源于相同产业的集聚，而大型城市的形成和扩张则是不同产业集聚的结果。

马歇尔关于规模经济的分类特别是海德森对外部规模经济的再分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我们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集聚的重要成因，集聚的效应又可以用区域化经济或者城市化经济来测度。

1.1.1.2 外部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

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中，将相关部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的集群称为“产业区” (industrial district)，并把这种“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的经济称为“外部经济”。这种“外部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二是专业化附属行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三是可以获得的技术和信息。这种通过集聚而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利益是地理上分散布局的产业所不能获得的。前两种称为金钱外部性 (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其特征是在降低本企业成本

的同时提高了其他企业的效益；最后一种称为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 economies），特征是每个公司都不能排他地完全拥有（exclusive possession）自己开发的技术和知识。

马歇尔认为劳动市场共享（labor market pooling）是造成经济活动集聚的基本因素。他在《经济学原理》中论述，由于信息不能充分流动，雇主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易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搜寻成本，而在一个“共享的劳动力池”中，“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很自然地去寻找有许多需要他们技术的雇主，一个孤立的工厂主，即使他可以很容易雇到大量的一般劳动，……雇主们往往到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具有优良的专门技能的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他们具有的技能的地方去。”^① 马歇尔得出的结论是，对专门劳动的需求与供给促进了工业在地理上的集聚。

其次是附属产业的成长，附属产业可以理解为关联产业，可以为其他产业提供中间产品。附属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机器和员工的使用效率，“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了，为产业中心提供工具和材料，组织交通，在许多方面有利于经济地使用原料。在一个有许多同类生产活动聚集的地方，即使该行业的个别资本不很大，高价值机械的使用有时也能达到很经济的程度。因为每一个附属产业虽然只服务于生产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分支，但它为附近的许多产业工作，降低了专用机械的使用费用……”^②。

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是马歇尔关于集聚经济的第三个重要原因，马歇尔认为，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在集聚在一起的企业之间传播和应用，因为信息在当地流动比远距离流动更容易。这样就产生了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技术外溢效果。产业的集聚使得“行业的秘密变得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对于机械、流程和企业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进，因其所取得的成绩，将迅速地为他人所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新思想，就会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又成为新思想之源泉”^③。

对于不同行业，以上三个方面的作用不同。事实上，不同行业产生的外

^①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ition, . Vol. 1, P27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reprint, 1961: 271.

^②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ition. Vol. 1, P272,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reprint, 1961: 272.

^③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ition. Vol. 1, P275,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reprint, 1961: 275.

部性的强度也不一样。海德森（1997）证明高科技行业的外部性更强，而奥德瑞茨（Audretsch, 1996）等则发现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外部性是最强的，产业集聚也最明显。应该说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但奥德瑞茨等还指出，一个行业的 R&D 投资越多，技巧熟练型员工（skilled worker）越多，大学科研机构雇员越多，则该行业的集聚越明显。

我们认为，产业集聚离不开外部规模性，但不同产业对外部性的要求不同，集聚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市场共享的因素有较强的依赖性，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更依赖于技术溢出，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多依赖于中间产品投入的共享，而服务业的集聚更加注重产品的差异性。

1.1.2 集聚经济理论

最早对集聚经济进行论述的是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 1909）。韦伯认为，产业集聚的一般原因是由于多个工厂集中在一起与各自分散时相比，能给各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和节省更多的成本，所以工厂有集中从而获取集聚经济的动力。而集聚经济又体现在“能够给工厂带来收益或节省成本，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靠近的原料供应点、大规模的劳动市场、公用设施、道路等都有助于生产成本的节约”^①。韦伯将以上影响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称之为区位因子，企业将区位因子合理组合以获取集聚经济。他将区位因子分为集聚因子和分散因子。所谓集聚因子，就是一定量的生产集中在特定场所带来的生产或销售成本降低；而分散因子则随着消除这种集中而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韦伯认为，一个工厂规模的扩大能使工厂平均成本下降，若干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更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所以工厂有集聚的愿望。韦伯在研究运输、劳动力成本的区位选择时，强调集聚经济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企业聚集产生的效益大于在分散状态下各企业所产生效益的总和。

韦伯把集聚经济产生原因归结为四点：第一是技术设备的依存。随着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加强，技术设备相互依存会促使地方集中化，实现集聚经济。第二是劳动力组织的发展。韦伯把一个充分发展的、新颖的、综

^① Weber A. The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29: 45.

合的劳动力组织看做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由于其专业化，因而促进了集聚经济。第三是市场化因素。韦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从而降低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第四是经常性开支成本。产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从公共产品的角度获取集聚经济。

胡佛从企业区位选择等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了研究，通过细分运输成本，修正了韦伯的理论，提出了终点区位论和转运点区位论，并把产业集群看做是具有“集聚体”规模效益的企业群体，集聚的主要成因是内在的规模报酬、本地化经济和都市化经济。^①

韦伯、胡佛对集聚经济的概括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却忽视了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

1.1.3 新经济地理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主要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聚集的动因。^②他在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是一篇更有影响和代表性的重要文献。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群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模型的基本框架是：假设有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农业部门是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另一地区的制造业部门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地在同一部门内流动。从而证明出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且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在克鲁格曼之后，福吉塔（Fujita）、万不勒斯（Venables）、欧台维诺（Ottaviano）、帕阿（Puga）等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了新经济地理学派的经典理论：集聚在一个区域的厂商越多，当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就越多，在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和正的运输成本假设之下，该地区工业品价格指数更低，这样会吸引更多的工人到这个区域，工人数的增加提高了对差异产品的更大需求，吸引了更多的厂商搬迁到该

^① 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② 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地区，如此良性循环形成经济活动的非均衡分布，出现经济活动的集聚区域。在克鲁格曼创立的中心—外围模型中，集中（向心）因素基本上是马歇尔所言的产生地方化外部性的三个方面，即劳动力共享市场、中间投入品的供给和技术外溢。运输成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是补偿空间集聚或分散的关系因素：运输成本越低，劳动力越具流动性，集聚因素就会超过分散因素；反之，则呈现相反的结果。^①

克鲁格曼的两区模型为后人研究产业集聚提供了实证分析的依据。他认为，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成为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并且把地区经济的研究与竞争、国际贸易等问题结合起来，是产业集聚研究的重大创新，对本文也提供了颇有借鉴意义的理论依据：一是现代服务业同业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很多行业如物流、连锁超市对运输成本的依赖性依旧很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往往成为金融、咨询业等发展的关键要素，因此可以初步推断现代服务业具有集聚的可能性；二是克鲁格曼提出的“历史依赖”性，说明集聚的区位选择可能是“偶然”的，告诫我们在集聚的萌芽阶段，政府过多地干预或者强行推动集聚区的形成可能是无效的，但是克鲁格曼认为“集聚是建立在简单的金钱外部性基础上的集聚”，忽视了技术外溢的作用。

1.1.4 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M. E. Porter, 1990）《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把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在该书中正式出现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波特认为的产业集群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研究而展开的，并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钻石模型”的构架主要由四个基本的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和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两个附加要素（机遇和政府）组成。波特指出，地理集中是充分发挥要素作用、实现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地理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将使四个基本要素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所有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提高自身生产率，从而形成产业区域、国家竞争优势。波特在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竞争优势的实现往往依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波特认为，产业群通过三种形式影响竞争力：一是通过提高立足该领域公司的生产力来影响竞争力；二是通过加快创新的

^① 张发余：《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评价》，《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11期。

步伐，为未来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来影响竞争力；三是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群本身来影响竞争力。波特以硅谷和奥斯汀的计算机产业集群为例，说明集群的企业通过创新可以获得比其他企业更明显的优势。^①

1.2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特征

1.2.1 集聚理论的适用性

现代服务业是否有集聚特征？制造业集聚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业？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斯科特（Scott）发现，产业集聚区域主要显著地建立在三大主要的产业部门重获新生的工艺和设计密集型产业，为最终消费生产产品的高技术产业、服务性产业，商业性服务企业。^② 凯勃（Keeble）也认为，高科技行业在某地的集聚会引发同处集群的其他企业分享外部性支出能力而带来的企业成本的节约。^③ 许多学者如莫利尔特（Moulaert）、盖劳治（Gallouj）等指出，制造业集聚的理论与模型并不适合服务业。因为服务性企业提供用户定制的服务，其创新的信息、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有别于为最终消费生产产品的制造企业。^④ 由于对服务业集群研究的不足，以及对用传统产业集聚的概念解释服务业集群的局限性，导致一部分国外学者试图开发出现代服务业集群的新框架。国内蒋三庚教授认为，现代服务业集群存在于城市中并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一个增长极”^⑤。

1.2.1.1 生产型服务业集聚理论

由于国外没有现代服务业的提法，关于服务业的论述集中于知识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因此关于现代服务业理论的综述蕴藏于生产型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的论述中，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莫利尔特、盖劳治只是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特性角度，质疑已有的集

^① Porter M E. On Competi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197.

^② Scott A J.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new industrial spac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8 (12): 171 – 186.

^③ Keeble D, Wilkinson F. High – technology clusters, networking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in Europe. Ashgate Aldershot, 2000: 1 – 20.

^④ Moulaert, Frank, Gallouj. 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firms: the limits of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in Daniels.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s Frank Cass, 1993: 91 – 106.

^⑤ 蒋三庚：《现代服务业集聚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1月。

聚理论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上的适用性，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依据。^①英国学者阿加克特（Alexander, 1970）^②对伦敦、悉尼、多伦多等城市的事务所进行调查发现，生产企业的经营者追求集聚的目的主要包括：有利于同政府机关的接触，有利于接近顾客，有利于接近关联企业，有利于接近其他服务业，有利于决策者集中等。丹尼尔斯（Dniels, 1985）^③指出，尽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往所需要的面对面联系方式已经较少采用，但其他许多因素，如传统和威望等人为因素，以及劳动力等经济因素都仍然会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办公场所向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集聚。埃尔瑞斯（S. Illeris, 1989）^④把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享受人力资源的“蓄水池”；第二，获得后向联系的机会；第三，获得前向联系的机会。塞恩（Senn, 1993）^⑤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一方面是因为位置上靠近可以使服务企业之间便利地享受相互间的服务；另一方面是缘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正是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的需求，促使生产性服务企业之间形成集聚经济。纳瑞什（Naresh）和盖瑞（Gary, 2001）^⑥分析了金融服务产业（包括生产性金融服务业和消费性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机理，认为从供应的角度看，集聚有利于获得专业化劳动力和金融服务企业之间的支持性服务；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服务企业选址于著名的服务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并且可以降低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有益于维持长期客户关系。

凯勃（D. Keeble）和纳彻姆（L. Nacham, 2001）^⑦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属于新经济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制造业从需求和供应等角度来探寻集聚利益，生产性服务业更应该从集聚学习和创新环境等角度来探寻集聚利益。

① Moulaert, Frank, Gallouj. 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The limits of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3 (5): 13.

② Anlexander L. Office lo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Methuen, 1970.

③ Dniels. *Service industries: a geographical appraisal*. Methuen, London, 1985.

④ S Illeris. *Producer services: the key factor to economic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89 (1).

⑤ Senn, Lanfranco: *Service activities'urban hierarchy and cumulative growth*.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3 (3) .

⑥ Naresh&Gary.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British Financial services*.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1.

⑦ D Keeble&L Nacham. *Why do business 1service firms cluster*.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2001.

罗福·斯特恩 (Rolf Stein) (2002)^① 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原因进行解释，他认为，生产性服务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经常会带来一种社会文化 (social – cultural) 上的接近，这种社会文化上的接近会使这些企业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念和默认的理解，形成一种非交易的相互依赖 (nontraded interdependence)，这种社会文化上的接近，能够使集聚的企业共同获益。

1. 2. 1. 2 知识型服务业集聚理论

关于知识型服务业集聚的研究起步较晚。莫利尔特和盖劳治 (1993)，斯彻帕 (Storper, 1995)，平治 (Pinch) 和亨利 (Henry, 1999) 认为，来自距离最小化的交易成本节约，其自身不足以解释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型集群活动的持续增长；相反，对这些企业举足轻重的是获取当地化和相对不流动的缄默知识以及知识外溢。^② 艾梅恩 (Amin) 和斯瑞夫特 (Thrift) (1992)、莫利尔特、盖劳治和 D. 凯勃等 (1998) 指出，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研究需要包含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网络、客户与集群企业间的联系。凯梅瑞 (Camagni, 1991) 和 D. 凯勃^③及威凯恩 (Wilkinson, 2000)^④认为，对于成功的知识型集群而言，蔚为重要的是与“创新环境” (innovative milieu) 有关的当地“集体学习过程”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他们强调特定产业或部门的企业在地区集聚的方式能随时间产生充满活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明显增强了企业的创造性及学习和分享集群企业所创造新知识的能力。D. 凯勃和 L. 纳彻姆 (Nachum) (2001) 研究了伦敦中心区的媒体集群，他们发现了地方化集体学习过程作为媒体集群创新和活力主要源泉的有力证据。^⑤ 他们进而详细调查了伦敦和南英格兰的 300 家中小型管理和工程咨询类企业，试图解释知识密集型的专业性服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何会聚集在像伦敦这样的

^① Rolf Stein. Producer services, transaction activities and cities: Rethinking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2 (6) .

^② Pinch S, Henry A.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he British motor sport industry.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 815 – 827.

^③ Camagni R. Local ‘milieu’,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networks; towards a new dynamic theory of economic space in Camagni, R. ed. Innovation networks: spatial perspectives.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1.

^④ Keeble D, Wilkinson F. High technology clusters, networking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in Europe. Ashgate Aldershot, 2000: 1 – 20.

^⑤ Nachum L, Keeble D. Neo Marshallian nodes, global networks and firm competitiveness. the media cluster of central London, ESRC 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1999: 154.